

# 圣经汉译研究:述评与展望

任东升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岛 266071)

**[摘要]** 圣经汉译活动是世界圣经翻译的一个分支,但有其独特性。大陆的圣经汉译研究起步较晚,学术意识淡漠。本文基于对圣经汉译研究历史和现状的述评,从五个方面对该领域做出展望,指出圣经汉译研究是中国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 圣经汉译;研究;述评;展望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06)03-0015-06

## 0 引言

孔慧怡(2002)鉴于现有的中国翻译史著述大多紧跟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来理解历史活动,提出了“重写翻译史”的命题。就大陆的圣经汉译研究而言,基本上是中国翻译研究中的学术空白,圣经翻译史及其隐藏的意义被长期忽视。本文拟对该研究领域的不足与现状做一述评,提出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

## 1 中国翻译史上的圣经汉译活动

《圣经》的翻译自公元前3-2世纪《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旧约》)问世以来,至今持续不断。丰富的圣经翻译实践不仅造就了廷代尔、马丁·路德等著名翻译家,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翻译理论。苏珊·巴斯奈特(Bassnett,2002:51)一言蔽之:圣经翻译史就是西方文化史的缩影。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划分为四个时期:

(1) 犹太教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译本以希腊文为主;

(2) 天主教时期(公元4世纪~16世纪初):译本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主;

(3) 新教时期(16世纪初~19世纪60年代):译本主要是德语和英语;

(4) 犹太教、天主教、新教合作期(19世纪60年代~21世纪):译本以英语为主。

从中文《圣经》的译本种类和读者数量而论,汉语也是第三、第四时期《圣经》译本的主要翻译语言之一。尤其是进入“传教世纪”(指19、20世纪)以来,圣经汉译活动紧跟世界圣经翻译的步伐,出现了翻译语言多样化、译本多元化、读者多元化的局面。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是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唐朝的圣经汉译活动与佛经翻译并驾齐驱,并受到佛经翻译的影响。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扮演了向中国译介《圣经》和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的双重角色。从1819年马礼逊完成整部《圣经》手稿到1919年官话“和合本”问世一百年间,是圣经汉译的黄金时期,出现了深文理(文言)、浅文理(浅文言)、官话(白话)《圣经》三类语体的全译本共九种。尤其是“和合本”的流传和影响“不仅在世界翻译史上,即使在圣经翻译史上也是罕见的”(严锡禹,2000)。可以说,具有1300多年的圣经汉译活动已经活生生地“镶嵌”于中国翻译史之中。圣经汉译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景教士译述期(唐代635年~845年):原文是古叙利亚文本(文庸,1992:31),汉译本被称为“景教本”(但没有流传),如最早的圣经汉译片断《序听迷诗所经》(636年);

(2) 耶稣会士摘译期(16世纪末~19世纪初,有间断):原文是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The Vulgate*,公元4世纪),主要译本有:阳玛诺的《圣经直解》(1636)、“巴设译本”(1700)、贺清泰的《古新圣经》(1803);

(3) 新教士全译期(1819~1919):主要翻译蓝本是英文本,如“钦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1611)及其“修订本”(*The Revised Version*,1885),主要译本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1823)、“代表译本”(1852;1854)、施约瑟的浅文理“二指版”(1902)、官话“和合本”(1919);

(4) 天主教、新教教内华人全译期(20世纪30年代~至今):主要翻译蓝本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和

**[收稿日期]** 2005-12-27

**[作者简介]** 任东升(1966-),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和《圣经》翻译。

多种英文译本,主要译本有: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根据原文翻译的“思高本”(1968)、吕振中译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全译本(1970)、以“现代英文圣经”(Today's English Version, 1976)为蓝本的《现代中文译本》(1979)、译自希伯来、希腊原文的《新译本》(1992)。

圣经汉译的主体有来华传教士(许多是翻译家、汉学家)、中国文人、教内华人翻译家和教外中国翻译家。从翻译主体的更迭来看,圣经汉译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传教士口授 - 中国文人笔录(635 ~ 845);

(2) 传教士主译 - 中国文人润笔(16世纪末 ~ 19世纪上半叶,有间断);

(3) 传教士 - 中国学者合作翻译(19世纪下半叶 ~ 1919);

(4) 中国翻译家独立翻译(20世纪30年代 ~ 至今)。

传教士 - 中国学者合作期的标志是王韬受聘襄理“代表译本”和王宣忱参加“和合本”的翻译。从翻译实践的形式来看,有宗教集体翻译(如唐朝的“翻经书殿”、各种“译委会”)、二人合作(如马礼逊和米怜、马士曼和拉沙)、独立翻译(如施约瑟、吕振中),形式多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翻译家陈梦家、李荣芳、吴经熊分别翻译的《雅歌》、《耶利米哀歌》、《诗篇》等圣经诗歌,展示了很高的文学翻译水平,表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对圣经诗歌汉译的强大制约作用。(任东升,2005)

## 2 圣经汉译研究述评

### 2.1 1949年之前的圣经汉译研究

19世纪后半叶,随着整部《圣经》被反复翻译成中文,传教士开始撰文介绍有关《圣经》的章节、页数和中文字数的文章。1869年1月《教会新报》(卷一87b)就登载了一篇文章“论翻圣经”。随后出现了对中文《圣经》版本的统计。1903年,T. H. Darlow和H. F. Moule编辑出版了“英国圣经公会”图书馆的《圣经》版本目录,分两卷由该会出版。1934年,上海“广学会”出版过一本80页厚的英文小书《汉文圣经译本小史》(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作者A. J. Garnier,贾立言)。同年,传教士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 1866 ~ 1937)撰写的The Bible in Chinese由“中国内地会”出版。该书分三个部分讲述自盛唐截至到1934年的圣经翻译史,包括中文圣经的翻译、印行、出版、分派。该书包含了珍贵的教会资料,是

研究圣经汉译(包括圣经被翻译成中国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最早的专著。由于该书系英文,在中国境内只限于教会圈里流传,所以影响不大。圣经汉译研究真正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初朱维之所著的《基督教与文学》。这部著作面向“基督徒青年”和“文学青年”而作,涉及广泛的内容。但是,在个别章节提及西方的《圣经》翻译和圣经汉译史实,对中国翻译家的圣经翻译做了初步分析和评价。如果从整部著作中抽出与圣经汉译密切相关的内容,足以合成一部圣经汉译研究的“微型本”。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由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大陆的圣经汉译研究根本就是空白。

### 2.2 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圣经汉译研究

新时期的圣经汉译研究以介绍英文《圣经》的翻译和圣经文学性为先声。涉及圣经翻译史的文章以谢雪如1984的“圣经翻译史话”较早,1988年,“圣经的翻译”专章出现在黄龙的《翻译学》(266 - 291)一书中。他在介绍了圣经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后,简略提到几个中文译本,认为“动态对等”的原则适合《圣经》的汉译。中国翻译协会的会刊《中国翻译》在1994年就刊登了一篇讨论传教士汉学家施约瑟《圣经》翻译原则的文章(作者张利伟)。

把圣经汉译研究提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则是20世纪之末的事。1997年出版的《中国翻译词典》列出了圣经汉译九大事件和“圣经汉语译本”词条(1135 - 1146; 596 - 597;但没有1919年后圣经汉译重要事件和中国翻译家的圣经翻译的记载),这标志着中国翻译研究界对圣经汉译研究给予应有的关注。随后,圣经汉译的内容进入教材,较早的有《世界名著汉译赏析》(王宏印编著,1998)。2002年,陈恒的文章“中国当建立自己的‘圣经学’——汉译《圣经》之考察”,对加强《圣经》内容和翻译两个方面的研究发出学术呼吁。

随着学术环境变得宽松,青年学者对圣经汉译研究也表现出浓厚兴趣。马乐梅(2001)任东升(2002)撰写的硕士论文分别对“和合本”翻译原则、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都不乏学术新意。

## 3 大陆圣经汉译研究的不足

有学者(王东风,2000)鉴于中国阅读《圣经》的人不多,就坦言《圣经》翻译理论不是中国翻译工作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参见杨自俭,2000:317)。究

其原因,大陆学术界受主流意识形态束缚,对《圣经》本身存有偏见、误解甚至无知,遑论系统、深入的研究了。

### 3.1 学术视野狭隘,部分学术禁区依然存在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圣经汉译研究本来起步就晚,翻译学术研究主流对佛经翻译研究比较宽松,而对圣经汉译研究十分谨慎。近20年来出版的几部大型翻译研究论文集,如《翻译论集》、《翻译新论》、《翻译思考录》、《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没有收录一篇有关圣经汉译研究的论文。由于学术指导思想狭隘、编审水平等因素,圣经汉译研究的某些成果无缘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交流。

### 3.2 研究分散而不成系统,学术实践比较混乱

由于不懂《圣经》的原文希伯来语、希腊语,多数学者无法从文本研究做起。学者们各守一角,彼此间缺乏学术交流,导致圣经汉译研究分散而不成系统。某些学者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使用的论据过于间接,某些论点也经不起推敲。某些关于西方圣经翻译史、圣经翻译观念的文章流于浮浅介绍和对比,甚至连起码的中文《圣经》版本、名称、文体等基本事实和概念都含混不清。如有的学者认为现在人们通常说的“钦定本”一般就是指“修订本”(见文庸,1992:26)。马礼逊的译本使用的是(浅)文言,有的学者不加考查,信口言之“白话文”(见蒋晓华,2003)。关于王韬是否亲自翻译过《圣经》,同一个学者的前后说法不一致(见《中国翻译简史》1984年版267页和《中国翻译史》1999版534页)。《中国翻译史》(上卷,马祖毅,1999:246)和《译经溯源》(赵维本,1993:43页)都认为,“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出版时间是1919年2月,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应该是1919年4月22日(尤思德,2002:329)。至于官话和合本《圣经》何以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本来是自马礼逊来华后基督教新教汉学家内部在圣经汉译过程中出现的神名“译名问题”的延续,与所谓的“旧教”,即罗马天主教已经毫无关涉,有的学者却不负责任地说:译本中把天主翻译为“上帝”,信奉旧教的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中译本的“上”和“帝”都是异教的用语,对天主是一种亵渎,要求在中译本里用“神”取代“上帝”。所以中译本分为天主教(旧教)的“神”版和基督教(新教)的“上帝”版。(见于刘小江编著《圣经故事》“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3.3 对重要史料挖掘不够,甚至长期忽视

圣经汉译理论和中国翻译家的圣经翻译是圣经汉译研究的重要史料,诸如《中国翻译史》、《中国译

学理论史稿》、《中国翻译文学概论》及《中国翻译文学史》等专著对这方面的材料多有遗漏,少有提及。如马礼逊在探索圣经翻译语言时提出“忠实、明达和地道(尽量典雅)”的标准(faithfully, perspicuously, and idiomatically (and if he can attain it, elegantly)(Strandenaes,1987:44)。作为非基督徒的严复曾经用其提倡的“汉以前字法句法”翻译了《马可福音》前4章(译文见李焱昌、李天刚,2000),然而,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却为绝大多数严复研究学者和翻译研究学者所忽略。《中国翻译词典》在介绍翻译家吴经熊时,说他翻译的《圣咏译义初稿》“曾震动当时的中国译坛”(林煌天,1997:733),就没了下文。殊不知这部译稿经过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的“手订”,其“钦订”性质本身就可以构成圣经汉译与中国意识形态关系的课题。

### 3.4 国内-国际、大陆-港台、教外-教内研究界隔膜很深

国际上有专门的圣经翻译研究学术期刊 *The Bible Translator*,教内圣经汉译研究者也有自己的交流园地,港、台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圣经》翻译和研究课程。中国大陆学术界没有这些有利条件。教内和教外学者在宗教信仰、学术视野、学术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海外和港台学者的研究仅限于《圣经》的宗教功能和教内影响,对中国翻译家的圣经片断翻译研究不够。中国大陆学者由于教育背景不同,学术环境所限,只局限于自己熟悉的领域。教内“有神论”和教外“唯物史观”根本指导思想的不同,导致了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因此,大陆无神论研究者的圣经汉译研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很难与教外、港台、国际圣经研究界产生有效的沟通。

## 4 圣经汉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跨入21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翻译事业躬逢其盛,各种翻译专项研究也受到重视,圣经汉译研究的学术氛围变得轻松活跃,对圣经汉译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时机已经到来。圣经汉译研究应该向以下五个方面纵深:

### 4.1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圣经》文本研究

在基督宗教圈内,《圣经》被认为是“神语人言”(God's Word in Man's Language. Nida, 1952)。对于《圣经》文本,我们应该坚持“唯物史观”,提倡辩正的科学的研究。由于宗教政治的原因,基督宗教三大教派对“圣经”应包含的书目存在分歧。就中国天主

教和新教(自称“基督教”)而言,各自形成了圣经翻译的传统,在重要术语甚至普通人名、地名的翻译上有明显区别。朱维之在1941年所著《基督教与文学》中提到除了《旧约》和《新约》66卷书外,还包括15卷“后典”。一些主要英文《圣经》译本,如“钦定本”、“新英文圣经”(New English Bible, 1971)“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 1976)都把“后典”15卷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1998年出版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也认为《圣经》包括《旧约》、《新约》和《后典》三部分(Baker, 1998:22-23)。鉴于此,从学术的观点看,“圣经”应包括《旧约》、《新约》以及《后典》(the Apocrypha)。

以现代阐释学的观点看,对《圣经》译本的各种“源本”和蓝本的阐释也是无穷尽的,《圣经》有被不断重译的趋势。鉴于各种《圣经》译本都是原文意义上的“子本”(daughter translations),已有的任何《圣经》译本,再标榜“忠实”,也不能视为与《圣经》原文“同义(synonymy)”或“同一(identity)”的文本,而只能是对原文“成功程度不一的转化(transposition)而已”(伊爱莲,2003:5)。对《圣经》源本的研究就是要从以希伯来语、希腊语为原始表现形式的“源本”着手,参照不同时代、不同语言、不同风格的各种《圣经》译本,既尊重犹太教和基督教研究和诠释圣经的科学——“解经学”(exegesis)传统,又要从非基督徒的角度理解《圣经》的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为重译《圣经》做好最基础的工作。

重译《圣经》一直是中国翻译家的梦想。这从1908年严复受聘翻译圣经片断,1935年郑振铎在《世界文学·发刊缘起》提出重译《圣经》的计划,1941年朱维之提出文学的圣经翻译设想可以看出。虽然1987年大陆学者张久宣翻译出版了《圣经后典》,但迄今为止大陆文学翻译界一直没有翻译出版过一部适合大陆文学读者阅读的《圣经》,也是个遗憾。

#### 4.2 圣经汉译史与中国翻译史的关系

“翻译是目的语文化里的事实”(Toury, 2001:29)。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圣经汉译活动与佛经翻译、社科翻译、文学翻译一样构成了中国翻译史的整体面貌。圣经汉译史既是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自成翻译传统。毋庸置疑,圣经汉译史是中国翻译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圣经汉译史研究主要包括史料搜集整理、圣经汉译史写作、圣经汉译主体研究三个方面。通过对圣经汉译史上某些重要史料的研究,我们对翻译的

本质和中国翻译史的某些固有认识可能会发生改变。以1908年严复翻译《马可福音》前四章为标志,中国翻译家开始介入圣经翻译,圣经汉译出现文学化的趋向。《圣经》翻译历来与民族和宗教政治的需要密切相关(Barnstone, 1993:186),《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也不例外。圣经汉译深受其发起人、赞助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又受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诗学规范、文人读经习惯的影响,在撰写圣经汉译史时对此必须有清晰认识。圣经汉译主体既有来华传教士和中国教内翻译家,也有文学翻译家,他们的文化身份不同,在对《圣经》的理解和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必定有所不同,这也决定了《圣经》译本在功能上的差别。

#### 4.3 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挖掘和研究

苏珊·巴斯奈特(Bassnett, 1995)说过,正是从圣经翻译及诸如奈达这些当代翻译家的理论阐述里,今天大半的译学研究才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根基。要进行圣经汉译理论的研究,就必须了解西方的圣经翻译理论。鉴于此,圣经汉译理论研究应包含三个方面。

(1)对西方圣经翻译思想和圣经汉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找出西方圣经翻译理论对圣经汉译的指导意义及其局限。圣经翻译理论家奈达把西方《圣经》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总结为“语文”、“语言”、“交际”三种途径(Nida, 2002),进而推而广之,用“语文学途径”、“语言学途径”和“社会符号学途径”概括为“三种主要翻译理论”(Nida, 2001)。奈达的“动态对待”翻译原则指导过《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可见他的翻译理论与圣经汉译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奈达把《圣经》翻译的特点看成翻译的普遍规律,“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朱志瑜,2004)。奈达提出翻译《圣经》的四项主要原则(参见Baker, 2000:22-28),是否完全符合圣经汉译实际,值得认真考察和检验。从翻译类型学(Reiss, 1989:105-115)的角度看,《圣经》其实是一个多种文本类型和类别的“合订本”,文本因类型和类别的不同,其“意图”和“功能”就会有所差别,翻译策略就不能一概而论。还有,马礼逊在19世纪20年代就基于自己用中文翻译《圣经》的经验,提出用忠实、明达、地道(能做到典雅更好)的文笔表达原作的意义和精神,1879年英国的圣经翻译家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 1719-1796)提出了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的翻译三原则(参见Kelley, 1979:210)。这两位分别使用英语和汉语翻译过《圣经》的翻译家提出的观点又与严复1895

年提出的“信达雅”原则有着惊人的相似。吕振中和《圣经新译本》译者都把“信达雅”兼顾作为翻译《圣经》的指导方针。中外圣经翻译家对翻译三原则的追求说明了什么问题？如果用“信达雅”兼顾的原则指导圣经汉译实践，如何具体贯彻？是否可以认为，随着人们对《圣经》文本文学性认识的加深，《圣经》翻译完全可以像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一样，追求“信达雅”兼顾的理想？

(2)认识圣经汉译传统的中国特色。来华传教士有其西方教育背景和文化身份，他们从西方带来了《圣经》原文，在翻译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遵从西方教会权威和圣经专家的解释，甚至模仿和借鉴他们的圣经翻译方法。然而，面对中国的特殊文化和时代背景，他们也在探索圣经汉译的有效形式和方法。因为圣经汉译过程自始至终都有中国文人参与，尤其是中国翻译家从不同于教内译者的角度理解和翻译《圣经》片断，所以圣经汉译传统具有某些独特性，带有中国特色。来华传教士（许多是汉学家、翻译家）的圣经汉译思想和理论表述，是否应该纳入“中国翻译理论”？

(3)中国翻译家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尤其是朱维之提出的类似“文学翻译”的圣经翻译思想，值得挖掘。李荣芳最初翻译《哀歌》时启用了“亚卫”神名（译文李焯昌、游斌，2003:199-211），而不采用教会的一贯译名“耶和華”，后来被大陆无神论学者朱维之、梁工等沿用，已经引起教会学者的重视。是否可以认为“亚卫”神名译法是中国特殊文学认知语境对《圣经》的标志性的诠释？吕振中和《圣经新译本》译者提出在圣经汉译中贯彻“信、达、雅”兼顾的原则，中国翻译家对待《圣经》的文化心理、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4.4 《圣经》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接受

汤因比(1988:272)说过：“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圣经》在中国语境中的阐释和翻译，离不开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译者及读者个人经验的参与。可以说，《圣经》的汉译过程即使很成功地完成，也并不能实现其原有意义的等量输出和等量接受。上世纪20年代以前，传教士拥有阐释和用中文翻译《圣经》的霸权，《圣经》的文本意义被限制在“宗教文本”的狭隘范围里。然而“和合本”的问世为圣经文化的传播和中国读者参与《圣经》的文学阐释提供了新的文本信息。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宗教也从来没有占据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圣经汉译的基本语境。中国翻

译史从佛经的翻译形成一大传统：虽然讲求形式和内容并重，但更趋向于对形式的重视。这种形式却非原作的形式，二是汉语文化所固有的形式。(Andre Lefevere, 1992:22)中国翻译家的圣经诗歌翻译也遵循同样的翻译传统。中国翻译家在翻译圣经诗歌时，采用了传统诗体这种符合中国文化的诗学形式。中国的翻译传统对圣经诗歌翻译具有强大的操纵作用。不信任任何有神宗教的中国文人把《圣经》与佛经同样看待，把文学性看作《圣经》的主导价值，这与西方基督教国度语境下对《圣经》的理解正好相反。中国文化传统、诗学传统和文人读经传统构成中国的文学认知语境，《圣经》在中国的接受无法摆脱这个特殊语境。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为《圣经》的文学性接受创造了必要条件。最初以宗教文本面目出现的《圣经》文本，经过中国文化环境的重塑，呈现出“翻译文学”的面貌。这正好应验了一句话：翻译出来的圣经不只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伊爱莲, 2003:5)。

#### 4.5 《圣经》译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圣经》译介影响研究旨在透过不同风格的《圣经》译本，研究流入中国文学叶脉里的圣经元素。周作人(1921)早就预见，《圣经》在中国由于“时地及位置都与欧洲不同，当然不能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在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与便利，这是我深信不疑的：这个动因当是文学的，又是有意的。”中国文学界及时介绍圣经文学，引导了文学青年对《圣经》文学的认识，甚至在文学青年当中引发了一阵“《圣经》热”。中国文学家出于精神的渴求、知识的兴趣和艺术的追求，主动汲取圣经文学。鲁迅在1924年创作的散文《复仇·其二》和茅盾在194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就是两个典型。这两篇文学作品因为过多采用《圣经》里的细节而缺少原创性，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拟作”，甚至“编译”。沈从文模仿《雅歌》创立了中国的“牧歌体”诗歌风格，许多现代作家也从学习《圣经》开始文学创作。可以说《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在这方面大陆比较文学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是还需要翻译研究者从译作影响的角度对《圣经》译本的文化功能和文学地位进行深入的研究。

#### 5 结语

我们虽不至于重写翻译史，但通过发现圣经汉译的历史真相，也能够对今天的翻译研究有所启示。

《圣经》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一百种译作之一(邹振环, 1996: 36-40), 圣经汉译活动已经融入中西文化交流史之中, 呈现出一道独特的脉络。对于圣经汉译史及其理论进行系统研究, 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不应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障碍。主动了解海外及港台同行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从中汲取可以为我所用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 才是我们应持有的态度。

#### 参考文献:

- [1] 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Z]. New York and London, 1998: 22-23.
- [2] Barnstone, Willis.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 Kelley, L. G..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9.
- [4]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5] Nida, Eugene A. *God's Word in Man's Language* [M].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2.
- [6] Nida, 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0-48.
- [7] Nida, Eugene A. *Theory and Practice* [A]. Bruce M. Metzger and Michael D. Coogan. *The Oxford Essential Guide to Ideas & Issues of the Bible* (American Edition) [Z]. New York: Berkley Books, 2002: 494-497.
- [8] Reiss, Christina.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A]. Andrew Chesterman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C]. Helsinki: Oy Finn Lectura Ab, 1989: 105-115.
- [9] Strandenaes, Thor (施福来).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nd Col. 1* (《中文圣经翻译原则》) [M].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7.
- [10]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11] 陈恒. 中国当建立自己的圣经学——汉译圣经之考察[J]. 世纪中国. 2002, (1).
- [12] 陈玉刚. 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 [13] 蒋晓华. 圣经汉译及其对汉译的影响[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4): 301-305.
- [14] 孔慧怡. 重写翻译史[J]. (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02, (6): 46-54.
- [15] 李炽昌, 李天刚. 关于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J]. 中华文史论丛, 2000, (64): 51-75.
- [16] 李炽昌, 游斌. 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 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7] 林煌天. 中国翻译辞典[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18] 马乐梅. 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原则之研究[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 [19] 任东升. 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M]. 天津: 南开大学, 2002.
- [20] 任东升. 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J]. 山东外语教学, 2005, (3).
- [21] 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文明经受了考验[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22] 王东风. 评 Nida 的读者同等反映论[A]. 杨自俭.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23] 文庸. 圣经蠹测[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
- [24] 吴经熊. 圣咏译义初稿[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6.
- [25] 严锡禹. 历史中的启示——对神学思想建设中圣经观的点滴思考[A].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圣经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社, 2000.
- [26] 伊爱莲(Irene Eber). 中文圣经的翻译、反响和挪用[A]. 伊爱莲. 圣经与近代中国[C]. 香港: 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 2003.
- [27] 尤思德(Jost, O. Z.). 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蔡锦图译)[M]. 香港: 国际圣经协会, 2002.
- [28] 郑振铎. 世界文库·发刊缘起[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 [29] 周作人. 圣书与中国文学[J]. 小说月报, 1921, (1).
- [30] 朱维之. 基督教与文学[M]. 上海: 上海书店, 1941/1992.
- [31] 朱志瑜. 类型与策略: 功能主义的翻译类型学[J]. 中国翻译, 2004, (5): 3-9.
- [32]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